

论伯明翰学派的建立

和 磊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内容摘要】伯明翰学派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派别,其建立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知识背景。首先是二战后英国社会所形成的各种危机,引发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次,英国社会在二战后出现的“愤怒的青年”反叛思潮,推动了伯明翰学派的建立。再次,从知识谱系上看,伯明翰学派通过批判当时已无力解读英国社会现状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开始建立起自己新的知识范式。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 文化研究 英国 文化主义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5-0171-04

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于英国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派别,它以对社会的激进批判为学术旨归,在世界范围的人文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独树一帜的重要学派。伯明翰学派的建立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知识背景,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二战后的英国社会的危机

具体说来,二战以后,英国社会在长时间的动乱中稳定下来,开始进行全方位面的调整,走向现代化,由此而出现了福利国家。随着福利国家的展开,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其曾经拥有的激进的革命意识却消退了,从而直接导致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消退。正如杜林(Simon Doring)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身份在这时候被弱化了,以至于人们逐渐地不再把自己认同为工人^{[1](P4)}。由此,社会主义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而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因为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在这里似乎失去了效用,剥削依然存在,但反抗为什么消退了呢?这也就是葛兰西在《社会主义和文化》中所问的问题:“既然向来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尚未实现呢?”^{[2](P5)}

与国内工人运动消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上的尖锐形势。在国际上,苏联入侵阿富汗、东欧的变化,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都使左派知识分

子进一步对社会主义陷入了极大的迷茫之中。

在文化方面,二战以后,随着英国社会的全面复苏和经济的转好,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混乱和道德秩序的失衡,尤其是随着美国大众文化的全面“入侵”,使得英国的本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必然引起了人们,尤其是有着深刻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注。如何面对现实,如何解释当前的危机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了最为紧要的问题。而利维斯主义的传统显然无法解决这一新的问题,它有的只是对现实的斥责和对逝去时光的惋惜。

丹尼斯·德沃肯在《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曾指出:“对于知识分子左派来说,1950年代是一个失败的十年。它与陷入窘境的工人阶级运动,与冷淡的选举,与知识分子从政治中的后退,与一种打着‘你从来不可能做得如此好’(You’ve never had it so good.)标语的英国保守党主义(Toryism)的复兴同义。统治了30、40年代的左翼知识文化,被一种沉闷的保守主义所控制,这种保守主义建立在传统的价值和复兴和对一种被确定为被思考和书写的最好的西方文化的保护的基础之上。”^{[3](P45)}事实正是如此。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英国的文化研究开始兴起,试图对社会现实进行一种积极的干预,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在社会实践上,一些积极进步的知识分子努力保持与工人

* 本文受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资金资助。

* 作者简介 和磊(1972-),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文艺思潮方面的研究。

阶级的接近,这就是战后的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正是通过参与这种教育,知识分子了解到了依然有很多工人对社会保持着积极的批判精神,这就是英国文化研究与成人教育的密切关系。威廉斯在《现代主义的政治》中就指出:“早在1940年代晚期……甚至是在1930年代,文化研究在成人教育中极其活跃”^{[4](P218)},而“正是恢复了努力对大多数人进行的平民教育,这种规划(指文化研究——引者)才完全获得了成功”^{[4](P219)}。也就是说,左派知识分子通过在成人教育中与广大的工人的接触,使他们更近地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及更为广阔的社会,从而为他们批判现实提供了切身的资源。

正是在这种英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以及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具体实践下,一些知识分子便开始寻找对策,并逐渐聚合起来,形成了“新左派”(New Left)。新左派并不是一个同质的集团,他们是一伙围绕着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危机以及共同致力于“核裁军运动”(CND)而聚集起来的知识分子。新左派最初是以两份刊物《新理性人》(The New Reasoner)《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为阵地,1961年,两份刊物合并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致力于批评专断的斯大林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试图在沉闷的英国社会中,在普遍的知识分子沉默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新介入社会现实,夺回一度失去的话语权。而他们所实行的策略就是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全面超越利维斯主义的传统,对英国社会进行全面反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兴起。由此,“在当时,文化研究并不就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而是一种文化政治层次的介入。”^{[5](P9)}

总之,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客观的社会现实的原因,但显然也是左派知识分子自主的知识选择,只是这一次的选择使他们与社会、与现实形成了割不断的密切关系,也使他们在知识退败时期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二、二战后英国社会的反叛思潮

与英国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知识分子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紧密相关的是,是英国社会在二战后形成了一股社会反叛思潮,在文学上主要体现为“愤怒的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文学运动。

“愤怒的青年”是二战后在英国出现的文学运动。这一名称来自于莱斯利·艾伦·保罗(Leslie

Allen Paul)所著自传体小说《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1951)和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1956)。尤其是后者,影响更为广泛,并使“愤怒的青年”一词最终流行。该剧通过主人公吉米·波特几乎垄断全剧的独白,深刻表现了战后整整一代人所积聚的不满情绪,以及被漠视的少数人对过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事件的极度失望。这是英国战后社会危机在文学上的集中反应。

除此之外,约翰·韦恩(John Wain)的《每况愈下》(Hurry On Down,1953)、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的《地方生活片断》(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1950)、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的《向上爬》(Room at the Top)、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幸运的吉姆》(Lucky Jim,1954年)、艾伦·西利托(Alan Sillitoe)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1958)和《长跑运动员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1959)、戴维·斯托里(David Storey)的《运动员的生活》(This Sporting Life,1960)、托马斯·欣德(Thomas Hinde)的《像拉里一样幸福》(Happy As Larry,1957)等作品,都是愤怒的青年运动代表性作品。

这一运动的青年作家其实并不属于某一具体的、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甚至互不相识,他们大多出身下层社会,目睹了战后英国社会病入膏肓的残酷现实,对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腐朽强烈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空虚,并由失望进而变为愤怒。他们以个人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再现了劳工阶级的生活和追求,在反映下层社会、攻击精神生活沉闷乏味和上流社会庸俗虚伪方面同声呼应。他们所塑造的愤怒的青年主人公都具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反叛,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消极的方式来对抗社会,向社会挑战。

这些愤怒的青年看到了英国如何由一个富足的文化霸权国家落败到一个破烂的国家的,由此而产生了愤怒的心情,他们或怨恨,或愤怒,或冷漠、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寻欢作乐,或隐居自逸,或追逐名利,或通过恶作剧和冷嘲热讽求得某种满足。

“愤怒的青年”给英国文学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首先就是作品的主人公由传统观念中的“英雄”转向了那些走在马路上的普通人,而且大都是社会的下层人。他们既没有多少令人羡慕的品质

或让人赞美的美德,但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罪犯、坏蛋。他们就是反传统的“非英雄”或“反英雄”人物。其次,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描述的不再是昔日常见的上流社会宽敞的客厅、豪华的陈设、绅士淑女或达官贵人高雅的谈吐,而是活生生的平民大众的真实生活,是杂乱甚至肮脏的工厂车间、机床、厨房、小酒店、狭小的住房、简陋的陈设和粗俗的谈吐。但也正是在这真实的描述中,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听到了自己熟悉的话语,宣泄了自己想宣泄的情感,从心底里产生由衷的共鸣^[6]。

可以说,愤怒青年文学运动把文学由精英走向了大众,由保守和认同走向了激进和批判,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大众能更为清醒地看清自己的处境和社会现实,这些无疑也为文化研究,为伯明翰学派的诞生提供了社会氛围和思想背景。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曾指出文化研究谱系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而霍加特、威廉斯等人也与过去有着深重的断裂。^[7]但高特(Philip Gaunt)却对此指出,霍尔的说法不错,但真正的断裂实际上是由愤青所发起的文学运动形成的,这是在二战后福利国家和一系列政治变动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动荡气候产生的结果。高特进一步指出,这虽然是一次简短的断裂(brief break),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许多这样的作家都转向了不同的方向(有的甚至走向了保守),但也就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却为文化研究的生根和成长打下了根基^[8]。

三、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及其困境

如果说英国社会危机引发了英国知识分子要重新解释社会、发出自己声音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的话,那么反叛思潮则进一步催生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成为伯明翰学派诞生的思想背景。但一个学派的产生,仅仅依靠责任感、使命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以一定的知识资源作基础。对于英国来说,其最为强大和丰厚的知识资源是文化主义传统,伯明翰学派要建立,显然是不可能无视这一知识资源的。有的学者就明确指出:“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英国的文化主义传统”^{[9](P220)}。霍尔也说:“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出现于50年代中期”^{[10](P43)},而20世纪50年代正是英国文化主义盛行的时期。但是,伯明翰学派是否可以直接从英国文化传统中“引申”出来呢?伯明翰学派是如何认识这一思想知识资源的呢?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英国文化主义有着渊源的历史,向上可追溯到阿诺德、艾略特,到利维斯,而往下则有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等人,其代表作也有许多,包括《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阿诺德,1869)、《伟大的传统》(利维斯,1948)、《识字的用途》(霍加特,1957)、《文化与社会》(威廉斯,1958)、《漫长的革命》(威廉斯,196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1963)等。

对于这些作品及代表人物,本文并不作过多的阐述。本文要阐述的是文化主义的总体特征,尤其是关注这些特征所存在的问题或文化主义的理论困境,从而阐述英国文化研究为什么会从文化主义传统中走出来,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英国社会进行新的分析和批判。

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大致可分作两个发展阶段,一是由阿诺德和艾略特发展而来,以利维斯为代表的采取文化精英主义立场时期。他们把文化看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而大众根本就没有文化,是缺少教养的芸芸众生,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但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这种精英立场逐渐被人们抛弃。威廉斯以“文化是普通的”(culture is ordinary)、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论断,把文化从少数人手里夺取了过来,放在了普通大众的手中,从而摆脱了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形成了文化主义的一次重要转折。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指出,“实际上并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作群众的那种看法”,而之所以把人看作为群众,“是为了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的目的”,由此,“我们真正检验的是这个公式,而不是群众。如果我们记住我们自己也一直被其他人聚集成群,将会有助于我们进行这种检验”^{[11](P379)}。由此,反对把人看作群众,并不是反对群众本身,而是反对那种有目的地看待人的方式,而打破这种看待人的方式或公式的根本目的,就是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一体的,从而取消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进而形成一个群众的“共同体”,一个文化的“共同体”,这显然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分。

那么,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主义有什么总体特征呢?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指出了文化主义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文化与经验^{[7](P47)}。文化通过经验得以传达,并通过关注人是如何经验其生存条件、社会实践,而把经验焊接到“整体的生活方式”中。这样,不同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实践

之间的区分就变得模糊了^{[12](P181)}。或者说,文化主义在作为一个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照下,一切都被文化化或经验化了,从而取消了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与不同,把所有的实践都归结为“经验”,文化成了观看世界的唯一视角。而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文化”这一维度,历史的变迁,过去与现在就“完全不能被充分地思考”,而这些社会变迁本身也是文化的^{[13](P32)}。由此,文化超越了所有的社会实践。这就是霍尔所指出的,在文化主义那里,“‘文化’不是一种实践……它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实践,是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总括。”^{[7](P53)}这就说明了,在文化主义内部并不是没有实践,但这实践只是内在于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体现。文化主义关注的不是实践本身,无论这实践是个人的社会实践还是社会的结构性的对立冲突,而分析实践只是“为了把握一个特定时代、作为整个经验性存在的所有实践和社会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7](P54)}。由此文化主义消解了“实践之间的区分”^{[14](P35)},最终把实践还原成了经验,文化的经验。而这由此而带来的是,文化是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而不是社会实践的斗争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前言》中指出:“围绕着‘文化’一词意义的许多问题,的确都是由‘工业’、‘民主’、‘阶级’以其自身的方式所代表的重大历史变迁所引起的”^①。在这里,“以其自身的方式”就体现了文化主义的文化是顺其自然这一根本特征。在《文化与社会》的最后一章,这一特征表现得就更明显了。威廉斯说:“文化观念有个比喻,扶持自然的成长。确实,最终必须强调的就是成长,不论成长是比喻或者是事实。”^{[11](P413)}这也就是说,文化并不是静止的,它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但这一历史是一种自然的成长,社会中虽有社会实践与斗争,但都是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自然而然的,只是文化发展的逻辑体现。

文化主义的这一特征,在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看来,绝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因为当把一切都归入文化和经验后,文化之间的斗争,比如资产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斗争给消解了,而阶级对于伯明翰学派来说,则是一个无论

如何也不能丢失的核心概念。由此,伯明翰学派在批判英国文化主义传统中,寻找另外的出路,这就是走向了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由此拉开了伯明翰学派的发展大幕。

注释:

①此段译文参阅了中文译本《文化与社会》第19页,但中文译本没有翻译出“in their own way”这一短语,据霍尔补出,见 John Storey,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New York: Arnold, 1996, P.32.

参考文献:

- [1] Simon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J]. London: Routledge, 1993.
- [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葛兰西文选. 1916-1935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3]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雷蒙德·威廉斯. 阎嘉译. 现代主义的政治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5] 陈广兴. 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 [A]. 载于陈广兴, 杨明敏编. 内爆麦当奴 [J]. 台北: 岛屿边缘杂志社, 1992.
- [6] 王佐良等主编. 英国 20 世纪文学史 (第 2 版)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7] 罗钢, 刘象愚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 [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8] Philip Gaunt. Birmingham Revisited: Cultural Studies in a Post-soviet World [A]. i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ume 30, Number 1, Summer 1996.
- [9] 萧俊明. 文化转向的由来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10] 陶东风等主编. 文化研究 (1) [J].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 [11] 雷蒙德·威廉斯. 吴松江, 张文定译. 文化与社会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2] Michael Pickering. History,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 [13]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A]. in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J]. London: Arnold, 1996.
- [14]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J]. London: Arnold, 1996.